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

#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 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

——以党的领导人关于文艺问题的三篇重要讲话为研究对象

赵炎秋

**【提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中国特色文艺理论及其话语构建有着密切的联系。构建中国特色文艺理论与其话语体系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精神与主要诉求之一。他以“工农兵”为核心，阐述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并围绕这一中心，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对文艺问题的观点与看法，论述了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学艺术的问题。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邓小平通过对文艺为人民服务的重新强调，对创作自由的肯定与阐述，对文艺工作者的充分信任，丰富与发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传统。这种丰富与发展一方面为中国特色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提供了新的内容，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中国特色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建设。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艺术的灵魂和对文艺批评的论述等几个方面，阐述了构建中国特色文艺理论与其话语体系的相关理论问题；从传统思想的继承与新的思想的提出两个方面，为中国特色文艺理论与其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具体的内容。

**【关键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 中国特色 文艺理论 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I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6)04-0059-10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党的领导人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有三篇重要文献尤其值得注意。一篇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延安讲话”)，一篇是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以下简称“祝词”)，一篇是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北京讲话”)。三篇讲话处于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三个不同时期

的集中体现。认真学习这三篇文献，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处于不同历史时期，三篇讲话的内涵与侧重也有不同，但都与构建中国特色文艺理论与其话语体系有着紧密的联系。

构建中国特色文艺理论与其话语体系是“延安讲话”的基本精神与主要诉求之一。在

“引言”部分的开头，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指出，座谈会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结论”部分的开头，毛泽东又指出，“我们讨论问题，应该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sup>①</sup>“延安讲话”的目的，是要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的文艺问题，解决文艺与其他工作的关系问题。因此，毛泽东没有现成的书本可以寻找，也没有现成答案可以照搬。他只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提出自己的观点，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是客观原因。主观上，毛泽东既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也是一个有着浪漫倾向的文学家，对文艺问题有着自己的看法。在“延安讲话”中，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建立中国特色文艺理论体系的要求，但从他一再强调要建立中国自己的民族文艺来看，建立中国自己的文艺理论似应包括其中。有学者指出，一般认为，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是毛泽东提出的，但实际上毛泽东只是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统一”作为对诗歌内容的要求。将其上升到创作方法的角度进行讨论，是周扬、郭沫若、张光年等学者的功劳，但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与肯定。不过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1938年，在为延安“鲁艺”题词时，他就提出了“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口号。为什么直到20年后的1958年才发展为“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流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一方面，这一方法已经包含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意思。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根

据地当时正在向苏联学习，没有必要另起炉灶。而1958年，由于中苏分裂，再继续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已经不大合适，有必要提出中国自己的文学创作方法，“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于是应运而生。<sup>②</sup>笔者认为，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它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毛泽东建立中国特色文艺理论与其话语体系的主张与诉求。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初步构建了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

首先，毛泽东以“工农兵”为核心，阐述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胡乔木认为，“延安讲话”有两个基本点：“一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一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sup>③</sup>这两个基本点，其实也是一切文艺理论的核心问题。在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上，有两种偏颇的看法，一种认为文艺是生活的机械再现，另一种则取消了文艺与生活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反对这两种观点。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sup>④</sup>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对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做出了明确回答：“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853页。

② 崔志远：《关于“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历史考察与反思》，《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③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7页。

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sup>①</sup>这段论述是十分完整、严密的。首先，它既强调了社会生活是一切种类的文艺作品的源泉，又强调了这是唯一的源泉。这样，就堵塞了一切可能的漏洞，在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上，将社会生活置于绝对的源泉的位置。其次，它说明了古代与外国的文艺作品也是彼时彼地的生活的反映，取材于古代与外国的文学作品，实际也是间接地取材于古代与外国的生活。再次，它说明了社会生活是如何进入文艺作品的，即要通过作家的头脑这一中介，从而强调了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克服了机械唯物主义。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sup>②</sup>而文艺高于生活的途径，就是典型化。典型化必须从生活出发，通过创造使生活更集中、更强烈、更理想、更美、更具普遍性；其目的是感染读者，“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其重点是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

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另一个核心。以人民为本位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根本的原则。在“延安讲话”的“引言”部分，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指出：“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强调指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sup>③</sup>

强调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一条红线。早在1888年，恩格斯就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sup>④</sup>列宁在1905年提出，文艺不应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应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sup>⑤</sup>毛泽东关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的论述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传统的继承，

又有明显地发展和自己的特点。首先，毛泽东突出了人民的主体——工农兵，从而使人民的内涵更加明确，更加符合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特色。其次，毛泽东围绕“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为工农兵服务”这一核心，全面、深刻、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文艺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完整的体系。再次，终其一生，文艺为人民（工农兵）服务的思想，一直是毛泽东强调的重点，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如此重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完全以人民（工农兵）为核心构建自己的文艺思想体系的，毛泽东还是第一人。

其次，在“延安讲话”中，毛泽东围绕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为工农兵服务”这个核心，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对文艺问题的观点与看法。如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文艺工作中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中的继承与创新问题，构建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学艺术问题等。其中，构建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学艺术问题特别值得注意。一个民族的文艺是否成熟，最重要的标志是其是否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有否自己独特的民族形式、民族风格和民族传统。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人，毛泽东十分重视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学艺术。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他明确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sup>⑥</sup>这段话虽然是针对学风而言的，但也可用于对文艺的要求。实际上两年之后，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0页。

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1页。

③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86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

⑤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35页。

⑥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文艺的民族化要求：“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因此，它必然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sup>①</sup>

在“延安讲话”中，毛泽东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学艺术的问题。其一，毛泽东指出了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学艺术的前提。毛泽东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文学艺术方面，不能跟在别的国家、别的民族后面亦步亦趋，而必须创造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本民族自己的文学艺术。其二，毛泽东指出了创造民族艺术的具体途径。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探讨。首先是描写现实的中国社会与中国人民特别是工农兵的生活。民族的文艺与民族所处的时代、社会，与民族的生活、思想、感情是分不开的。而不同的民族，其社会生活、思想感情、风俗习惯是不同的。描写本民族人民的生活与思想感情，文艺自然也就具有了本民族的特色。在“延安讲话”中，毛泽东反复呼吁文艺工作者深入到人民大众中去，描写工农兵的生活与斗争，实际上也是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民族艺术的必然要求。其次，是采用民族形式。文艺的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是在民族生活与民族艺术的长期积累中形成与发展的，有着深厚的民族根基，受到本民族广大成员的喜爱。因此，创建民族的文艺而不采用民族的文艺形式，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而北辙。自然，采用民族形式也不是拒绝采用外国的文艺形式，但不是生搬硬套，而是要把外国的形式与民族的形式结合起来，通过吸收外国形式中有益的东西，丰富、发展民族的文艺形式。<sup>②</sup>再次，要学习运用人民大众的语言。语言是文学的载体。离开语言来谈文学的民族化，是根本不可能的。规范、典型、纯正的民族语言的根基存在于民族最大多数成员日常使用的语言之中。这不仅是因为人民大众的语言是民族语言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因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当然应该运用人民大众自己的语言。在“延安讲话”中，他批评许多文艺工作者“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

识”。他们“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他要求文艺工作者与群众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sup>③</sup>因此，他反复要求作家深入人民大众，学习人民大众生动丰富活泼的语言。

由此可见，无论主观还是客观，“延安讲话”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中国特色文艺理论与其话语体系的首次成功尝试。

## 二

据胡乔木回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郭沫若曾发表意见说，“凡事有经有权”。毛泽东对此说法十分欣赏，觉得找到了知音。胡乔木解释说，“郭沫若的意思是文艺本身‘有经有权’，当然可以引申一下，说讲话本身也是有经常的道理和权宜之计。”<sup>④</sup>“延安讲话”发表的1942年，正是我国抗日战争的转折时期。战争环境、农村背景，调动一切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中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在这种背景下，“延安讲话”也有些侧重，如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上侧重政治，在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上侧重普及，在工农兵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上侧重工农兵，在歌颂与暴露的关系上侧重歌颂等等。而这些本应是阶段性的任务和策略，本应是“权”的东西，在新中国成立、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707页。

② 1956年，在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表示，“外国的许多东西都要去学，而且要学好”，“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东西”。但是，“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这是毛泽东关于民族文艺与外国文艺间关系的思想的集中表现。参见毛泽东：《同交响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80页、83页、82页。

③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0~851页。

④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0页。

共产党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并没有得到及时调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发表了《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

在“祝词”中，邓小平首先对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在政治上作了肯定：“回顾三年来的工作，我认为，文艺界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文艺工作者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爱护和尊敬。斗争风雨的严峻考验证明，从总体来看，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好的。有这样一支文艺队伍，我们党和人民是感到十分高兴的。”<sup>①</sup>如果联系到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对科技队伍的肯定，<sup>②</sup>邓小平对文艺工作者的肯定实际上是在毛泽东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延安讲话”中，毛泽东虽然肯定中国革命离不开革命文艺，因而也离不开文艺工作者，但文艺工作者主要还是团结改造的对象，与工农兵是分隔开来的。而在邓小平的“祝词”中，文艺工作者实际上已经成为人民（工农兵）的一部分。虽然，“祝词”仍旧强调人民与文艺工作者之间教育与受教育的关系：“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但这种教育与被教育实际上是人民内部的相互学习。因为“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sup>③</sup>文艺工作者接受人民的教育，从人民中间吸取营养，同时又教育人民、给人民以营养。两者之间不是单方面的教育与给予，而是相辅相成、互为对象的关系。虽然在这种关系中，人民仍是主体，但文艺工作者已不再只是思想改造的对象，他们还有教育、引导人民，“通过自己的创作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的责任。<sup>④</sup>很明显，在邓小平的文艺思想中，文艺工作者在政治、思想与情感上都与人民处于同一层次。

“祝词”强调：“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sup>⑤</sup>“人民”是“祝词”中

的一个关键词。邓小平认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sup>⑥</sup>文艺要为人民服务，首先就要表现人民，表现他们的优秀品质和他们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文艺要塑造社会主义的新人形象，塑造“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并通过这些形象来激发人民、推动人民、教育人民，使他们积极投入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中去。<sup>⑦</sup>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工作者就要“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文艺工作者要“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攀登“艺术的高峰”，“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sup>⑧</sup>文艺为人民服务还意味着，“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sup>⑨</sup>只有人民，才是文艺作品、文艺工作者的优劣、好坏的最终评判者。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基本原理，更是对当时依靠权力或者依傍权力进行文艺批评的不良现象的直接否定。

其次，“创作自由”是“祝词”的另一个关键词。邓小平引用列宁的话，指出：“在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英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② 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肯定，中国的科技队伍“就整个说来，不愧是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1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1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8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9页、211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0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1页、212页。

⑨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2页。

雄人物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sup>①</sup>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我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sup>②</sup>是因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艺术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艺术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sup>③</sup>除了提出一个政治正确的原则即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外，整个“祝词”几乎没有对创作自由提出什么前提、设置什么限制，可以说是“延安讲话”以来对于创作自由的最为肯定的表述。它是“双百方针”的继续，但比“双百方针”更加清晰、更为具体。

与创作自由相联，批评也应该是自由的。“祝词”指出：“虚心倾听各方面的批评，接受有益的意见，常常是艺术家不断进步、不断提高的动力。在文艺队伍内部，在各种类、各流派的文艺工作者之间，在从事创作与从事文艺批评的同志之间，在文艺家与广大读者之间，都要提倡同志式的、友好的讨论，提倡摆事实、讲道理。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sup>④</sup>这既指出了批评的必要性，又指出了批评的方式与目的。

“祝词”认为，文艺离不开党的领导，但是“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换句话说，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思想、路线、方向的引导与把握上，其他方面，则“不要横加干涉”。不仅如此，各级党组织还应在“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sup>⑤</sup>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领导不仅不会削弱创作自由，而且会增加创作自由。党的领导是创作自由的保证。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的主要目的是恢复正确的文

艺思想，尽快繁荣中国的文艺。但是“祝词”在“延安讲话”的基础上也有新的发展。首先，它坚持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新的条件下充实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内涵。其次，它在政治上肯定了文艺工作者，重新界定了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的关系，将文艺工作者从过去种种有形与无形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身心得到极大解放。再次，它肯定了创作自由，并从多方面进行了阐述，极大地解放了文艺生产力，调动了文艺工作者创作的积极性，扩大了文艺的表现范围、表现对象和表现手段。可以说，整个1980年代文艺的发展与繁荣，与“祝词”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祝词”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构建中国文艺理论体系的问题，但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既是繁荣文艺的必然要求，也是繁荣文艺的必然结果。“祝词”通过对文艺为人民服务的重新强调，对创作自由的肯定与阐述，对文艺工作者的充分信任，丰富与发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传统。这种丰富与发展一方面为中国特色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提供了新的内容，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中国特色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建设。

### 三

自“祝词”发表之后，到2014年，35年过去，中国社会与文学艺术发生了质的变化。就经济来看，中国经济总量由1978年位居世界第十，到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由1978年的1.8%，到2012年提高到11.5%。就社会发展来说，1979年的中国还是一个以农村、农业为主的国家，到2014年已经成为一个初步实现城市化的国家，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成为全国人口的大多数，部分大中城市已经进入消费时代。就文艺而言，中国文艺早已摆脱短缺状况，进入全面繁荣时期。通俗文艺盛行，视觉文化、大众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0页、211页、21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0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3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2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3页。

文化从无到有，从有到多，占据文艺生产、消费的半壁甚至多半壁江山。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文艺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正好回应了时代的呼唤。

从构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角度，“北京讲话”有五个方面的内容，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其一，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sup>①</sup> 这些论述明确指出，文化的繁荣兴盛在中华民族复兴中的重要作用。民族复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物质，一是精神。文化属于精神层面。民族文化不仅是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民族精神的构建者、引领者。《毛诗序》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sup>②</sup> 这段话前半段论述观察音乐，或者说，观察文艺的状况可以了解社会状况；后半段论述诗或者说文学可以建构、引领民族精神。文艺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没有民族文化的兴盛不行，没有民族文艺的繁荣也不行。而民族文艺的繁荣、兴盛，少不了中国特色文艺理论繁荣发展，少不了中国文论自己的话语体系的构建。

其二，习近平认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sup>③</sup> 中国的文学艺术之所以是中国的，就是因为它蕴含、表现了“中国精神”。文艺如此，文艺理论也应如此。而且，由于它是理论的形态存在的，其相关的思想往往通过更为直接的话语表现出来。因此，它对“中国精神”的表现应该更为明确。而要使中国文艺理论表现出“中国精神”，就必然要求它有自己

的理论和话语体系。习近平要求中国的“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要向世界宣传推介我国的优秀文化艺术，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sup>④</sup> 笔者以为，习总书记的这一要求不仅适用于中国文艺和文艺工作者，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的文艺理论和文艺理论工作者。中国的文艺理论同样也应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使外国民众和文艺理论工作者能够通过中国的文艺理论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增加对中国文艺和文艺思想的认识。这实际上是从民族复兴的高度肯定了构建中国自己的文艺理论与其话语体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其三，“北京讲话”强调了文艺批评的作用。“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作家艺术家要敢于面对批评自己作品短处的批评家，以敬重之心待之，乐于接受批评。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

①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②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3页。

③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④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sup>①</sup> 这些论述内涵丰富,十分重要。第一,它指出了文艺批评的作用与重要性,认为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是相辅相成的,文艺批评能帮助文艺创作健康发展。第二,它强调了文艺批评的批评性。文艺批评要实事求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第三,它说明了作者艺术家对待批评应持的态度:要乐于接受批评,认真对待批评。第四,它说明了文艺批评的原则,即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指出了文艺批评的三大理论与思想来源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和西方文艺理论;指出了这三大来源与文艺批评之间的关系是指导、继承创新和批判借鉴的关系。第五,值得重视的是,习近平明确指出,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扩展点说,当然也不能套用西方的理论来剪裁中国的现实和文艺创作实践。这就要求中国的文艺理论家建构起自己的、符合中国社会和文艺实际、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实际的文艺理论和话语体系。习总书记的这些话,针对的是文艺批评,实际上完全适用于中国特色文艺理论的建设。

如果说,上述三个方面涉及的主要是构建中国特色文艺理论与其话语体系的相关理论问题。那么,“北京讲话”也为中国特色文艺理论与其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具体的内容。这具体地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北京讲话”在新的形势下,重新阐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基本问题和重要关注。如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sup>②</sup> 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问题,人民本位的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诚如习近平所说,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党的历届领导人都把人民摆在首位,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首要任

务。“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习总书记提出的这三个命题很好地概括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sup>③</sup> 再如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问题。习近平认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把握住两条:一是要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sup>④</sup> 这里的思想与毛泽东“延安讲话”和邓小平“祝词”的思想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延安讲话”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要服从党在一定时期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文艺应团结在党的周围;“祝词”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求各级党委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领导文艺。“北京讲话”的思想和精神与之是一脉相承的。

其二,“北京讲话”根据新的时代新的现实,提出了新的文艺思想。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同样,一代也有一代之文艺思想。新的时代、新的现实、新的文艺实践必然要求新的文艺思想与之匹配,也必然会产生新的文艺思想。“北京讲话”感受着时代的脉搏,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文艺思想。如在谈到文艺作品的评价问题时,习近平指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许多文化产品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当然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然而,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sup>⑤</sup> 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偏远农村地区还未完全脱离农耕时代,而大中城市已经进入消费时代。但市场经济已在

①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②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③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④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⑤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全国铺开，却是不争的事实。适应这种现实，“北京讲话”提出了社会价值和社会效益以及市场价值和经济效益等两组文艺作品的评价标准，并对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前者是第一位的，后者是第二位的，当两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后者要服从前者。但“北京讲话”又并不认为两者是必然矛盾的，两者也有统一的一面，应该找到两者之间的契合点。“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sup>①</sup> 这种既辩证又创新的文艺思想在“北京讲话”中可以说随处可见。

但最值得注意的是“北京讲话”对于优秀文艺作品的呼唤与提倡。“北京讲话”用整整一章的篇幅，阐述了“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的问题。习近平认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习总书记批评了当前文艺界普遍存在的“浮躁”之风，和“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要求文艺工作者沉下去，写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艺精品。<sup>②</sup> 优秀作品是一个时代文艺的旗帜、是衡量文艺是否繁荣的标志。一部精品抵得上百部、千部庸作。唐诗如果没有李白、杜甫，很难说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顶峰，明清小说如果没有四大名著，也很难谈得上繁荣。习近平认为，优秀作品就是“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作品。<sup>③</sup> 一部优秀作品，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形式上都要有高的质量，能够深入人心，在时间的长河中能够立得住脚，得到人民的喜爱和认可。“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sup>④</sup> 各种类型、各种方法、各个层次的创作都可以出优秀作品，这一思想十分重要。我们已经进入消费时代。消费时代是以消费者为主导的时代，文艺的消费者也即读者和观众是多元的，其要求也是多元的，不能用一种思想、一种文类一统天下。这自然就不能人为地将文艺划分为高级、低级等类型，提倡一类打压一类。任何文艺消费的要求都有权利得到

满足，任何种类的文艺作品都有权利存在。但各种类型的文艺消费者都希望得到脍炙人口的作品。这应该是“北京讲话”强调文艺的各个领域、各种各样的文艺都能出也应该出优秀作品的时代原因。笔者以为，从毛泽东强调向工农兵普及文艺，到邓小平希望“我国文学艺术蓬勃繁荣、争奇斗艳”，<sup>⑤</sup> 到习近平提倡文艺精品，既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变化，也显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新的发展。<sup>⑥</sup>

应该指出的是，即使在讨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基本问题时，习近平也不是老调重弹，而是根据新的时代、新的现实提出新的说法、新的论述。如在谈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人民学习时，习近平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文艺工作者“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因此需要向人民学习。<sup>⑦</sup> 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人民学习，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思想。“北京讲话”依然强调这一点，但在具体论述时却没有从传统的途径如文艺应为人民服务、或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老师等入手，<sup>⑧</sup> 而是从人民是由不同个体组成的这一前提出发。个体各有自己的规定性，文艺工作者要表现人民，就必须深入了解组成人民的各个成员的个体性，这样才能真正地写好人民。再如，在谈到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时，“北京讲话”也没有从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或者党是全国人民的

①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②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③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④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4页。

⑥ 笔者在一篇文章中已经讨论了这一问题，此处不再赘述。参见赵炎秋：《重视普及与呼唤精品——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文学批评》2015年第2期。

⑦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⑧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说法是错误的。

领导核心这个角度出发,<sup>①</sup>而是指出“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艺的根本宗旨也是为人民创作。把握了这个立足点,党和文艺的关系就能得到正确处理,就能准确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政治立场和创作自由的关系”。<sup>②</sup>从“根本宗旨”这个角度出发,不仅仅是换了一个论述的角度,也是换了一种思维方式,把党和文艺的关系放在了一个新的联系之中,不仅更有说服力,也更有亲和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构建中国特色文艺理论与其话语体系,不仅是时代与现实的需要,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一贯追

求和一直主张。这既是中国文艺理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完善发展的必然一环。

本文作者:文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文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左杨

① 同样,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说法是错误的。

②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 Chinese Marxism Literary Though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Discourse System: A Study of Three Important Speeches by the Party Leaders

*Zhao Yanqiu*

**Abstract:** There is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Chinese Marxism literary though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discourse system. Constructing the literary theory and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part of the essence and one of the main requirements in Mao Zedong's "Speech on Literature and Arts Forum in Yan'an". In this speech, Mao Zedong preliminarily set forth his system of literary theory. Focusing on workers, peasants and soldiers, he expound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s and people and between arts and life, gave his views and opinions on literature and arts, and discussed the problem of creating China's own literature and arts. In "The Opening Speech of the Fourth Congress of Chinese Literature Figures and Artists", Deng Xiaoping emphasized that literature and art should serve the people, affirming the freedom of creation and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fully trusting literature figures and artists. In this way, he enriched and developed Chinese Marxism literary thought and tradition, which both provided new contents for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nd discourse system and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nd discourse system. In "Speech on the National Forum of Literature and Arts", Xi Jinping elaborated such theoretical issues in constructing literary theory and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 needs a thriving and prosperous Chinese culture; the spirit of China is the soul of socialist literature and arts; literary and art criticism are important. Inheriting traditional thoughts and putting forward new ideas, Xi's speech gives new dimens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theory and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Chinese Marxism literary thought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terary theory; discourse system

## 作者简介：

赵炎秋，男，湖南邵阳人。现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学研究》主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82年毕业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中文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86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导师周骏章先生；199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导师童庆炳先生。2002年、2006年、2009年、2012年曾先后赴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英语系、加拿大康科迪亚大学现代语言系、英国剑桥大学英语学院、日本日本大学文理学部做访问学者或研究学者。1996年评为教授，2002年评为湖南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2006年评为湖南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英美文学。在文学形象研究、狄更斯小说研究、小说一叙事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文学伦理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等方面有一定成果，得到国内同行的认可。主要科研成果有专著《狄更斯学术史研究》（合著，排名第一，2014年）、《明清近代叙事思想》（独著，2010年）、《形象诗学》（独著，2004年）、《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独著，1996年）等12部；译著《狄更斯研究文集》（编选，译者之一，2014年）、《马丁·朱述尔维特》（主译，2012年）、《僧侣》（独译，1998年）、《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独译，2006年）等5部；自1984年以来，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学术月刊》、《外国文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主编教材、丛书8部（套）。业余从事文学创作，已发表中篇小说《敬蛇冲纪事》、《人子降临》2篇，短篇小说和散文3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3个，教育部课题3个，省社科基金课题6个。专著《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2002年获湖南省首届社科规划课题成果奖二等奖，《形象诗学》2006年获湖南省第八届社科成果奖二等奖，《明清近代叙事思想》2012年获湖南省第十一届社科成果奖一等奖。系列论文“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2015年获湖南省第十二届社科成果奖二等奖。



（左杨）